

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隨筆集

經濟學 與常識

● 張宇燕

Economics And
Common Sen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隨筆集

經濟學 與常識

F-49
271

張宇燕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特邀策划:伍江陵
责任编辑:王森
封面设计:文绍安
监 制:华 西

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书 名

经济学与常识

定价:12.80 元

作 者 张宇燕

ISBN7—5411—1489—8/I·1387

1996 年 5 月 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峨影印刷厂印刷

18



张宇燕

张宇燕，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和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分别获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86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副研究员；1992至1993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行为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论经济体制的择优”（载《管理世界》1991年第四期），“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三期），“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六期）；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

前 言

至少在五年前，我曾读到思想家卡尔·波普写的《我的哲学观》。在此文中他写道：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哲学家，只不过某些人具有更多的哲学家之味道罢了。在我看来，波普的这番关于哲学家的议论，完全适用于经济学：人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不同的只是个别人更带有经济学之色彩而已。也许人们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所说的“经济学色彩”指的是什么？对此，回答恐怕因人而异。依笔者之陋见，少数被称之为专业经济学家的人，大多使用某种独特的语言来从事其所谓的研究工作。这种语言既不同于物理学语言，又有别于心理学，且更差异于日常语言，尽管它们相互渗透。另外，这批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程度亦大大高于非专业经济学家。之所以会如此，恐怕与经济学的“职业化”密不可分吧！专业经济学家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倘若人人均能轻轻松松地就经济问题用经济学语言发表出真知灼见，那么，专业经济学家的饭碗就有丢掉的危险。

或许就是在这种危险面前，当然也极可能是为了科学上的严谨，经济学开始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自我保护和“科学化”之路：先是用一套普通人不太熟悉的概念来替代日常语言，之后再再用大众更为陌生的数学来使经济学形式化。公平地说，经过

多代经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至少按照通行的科学判定标准，经济学已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分支中“科学”色彩最浓厚的了。然而我以为，即使对此不做感情上的判断，踏上这条道路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世人对专业经济学家有下面一种评判，说经济学家大致由两类人组成，其一为无知的人，其二为目前尚不知自己是无知的人。在我看来，世人如此评说经济学家，原因多与经济学日益符号化或形式化有关，多与它离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有关，似乎只要掌握了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必备的数学工具，无须观察和理解世事便可成为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学鼻祖。他一生中写了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即《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被后来者奉为圭臬的这两部经典之作，都是用日常或至少接近日常语言写成的，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亦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了，比如讲，前一本书的副标题如下：“关于人们首先对邻居、然后对自己的行为和性格进行自然判断的原理的分析论文”。在《国富论》中，他借别针生产之事例来阐述分工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世人津津乐道。尽管不少人把亚当·斯密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家，并认为其理论如果不被高度形式化就无法跻身于“科学”之林，但科学理论，无论多么高深、多么抽象，其“科学性”的判定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能够被最终还原为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讲，真理永远是具体的、简单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恐怕还和其表达方式密不可分。《庄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著作，不都是由那些充满了睿智、颇具启发性的“故事”构成的吗？在大量的成语、俗语的背后，同样是一个又一个“故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人成虎”、“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田忌赛马”、“放长线钓大鱼”等，所对应着的正是下面的经济学概念或理论：帕累托最优，外部性或搭便车，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比较利益，博弈论，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经济学的渊源，或是将经济学还原成中华文化中的对应范畴，从而让经济学之基本道理具体化、通俗化，恐怕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认知思路或认识逻辑的。

“回到常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口号，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内容：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在于对那些流传广泛并颇有影响的理论做出批判性考察，从而使之成为常识。如果说亚当·斯密的著述属于某种粗糙的、支离破碎的、需要整理与提炼的古典理论，并且后一项工作已被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完成，那么到了今天，将被抽象化、科学化了的经济学理论，需要的恐怕还是回到常识。就回归的途径而言，则无非是用常识性语言来讨论经济问题，准确讲，是用被“常识化”了的经济学的概念与逻辑，来谈论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及业已形成的观念。

我在此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直接的目的大概也只有一个，即给出此本文集取名为《经济学与常识》的理由。虽然本书并非每篇文章都是围绕着此主题展开讨论的，但它的基本叙述手法的“常识化”倾向，却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其中的数篇书评，在此我打算着重说明的是，写作实乃学习或掌握知识的最佳途径。

本书收录的文章，其写作的时间跨度大约是1987—1995年。从这八年内的30余篇文章中，读者是不难发现我思考问题及表述方式的变迁轨迹的。其中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至于“账”吗，自然应算在我这个作者头上，而与在本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中给我帮助的诸位无关。这里我特别想对如下几位深表谢意，他（她）们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高海红和王宇女士，及我的学生何帆。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1)
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	(1)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谈起	(10)
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科学方法论	(18)
表述方式、经济效应及其他	(25)
制度选择、历史哲学与苏联经济史	(33)
经济学与道德行为	(43)
经济学中的时间	(54)
“假如没有.....”	(65)
“三生万物”	(74)
不确定性：人类的朋友	(83)
消费与储蓄	(91)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102)
经济学·生理学·病理学.....	(112)
如果大家都觉得世界金融体系即将崩溃.....	(121)
经济体制的“主义分类”与整体演进.....	(127)
谈谈里斯卡的“承包经营制”	(135)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经济改革.....	(147)

高斯定理·产权·经济制度·····	(160)
凡勃伦和他的《有闲阶级论》·····	(172)
战争的启示·····	(186)
企业家的性质·····	(196)
经济体制的太极图·····	(203)
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210)
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	(224)
《经济学消息报》采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者的问题·····	(233)
有关公共选择理论的几点想法·····	(238)
由制度安排决定的经济发展·····	(243)
解读“行政性一致同意”·····	(251)

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

记不起是在哪里读到这样一句话，说经济学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我不敢夸口说自己属于悟出经济学真谛的那一群人。但我想“悟”这一体验活动本身恐怕还有个层次问题，或是三六九等。既然“悟”本身有深有浅，那么谈出来也就不怕貽笑大方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对各种社会现象给出自己的解释，或是相反，从各类现象中得到对经济学的检验，即所谓于微见著。这里之所以给“科学”两字打引号，其原因在于此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马蜂窝。“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在此我们就姑且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吧。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曾经写过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导论》的书。在其中他特别讨论了“追捕问题和最优控制”。（注意，我们的主角开始登场了）假定有一只狐狸发现了远处有一只兔子并追捕之。兰格的故事中的主角是狗和兔子。考虑到狗在人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我在此用狐狸替代之，并且相信这同样能够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兔子这时沿横坐标轴逃窜，而狐狸则沿纵坐标轴向下方追赶，由于兔子沿横向奔

跑，为了捉到之，狐狸自然会不断调整追捕线路而向右下方追赶。最后狐狸在横轴上的某一点上捕到兔子。而显然其追捕路线是一条弧线而非直线。在此兰格指出，所谓最优控制就是使狐狸跑直线（短于弧线），即最经济地捕捉到兔子。无疑，这个故事在说明最优控制上十分成功，但遗憾的是，事实恐怕远非如此，因为兔子绝非是一味地逃跑而不考虑敌人的方位。换句话说，狐兔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关系。这也就是说，兔子为了活命在发现敌人之后自然会选择最有利的逃跑路线（即和狐狸追捕方向相同），除非有其它障碍。在此需要说明一点，本文并非是讨论兰格及最优控制，而仅仅是顺带提及一下控制论，并借追捕问题来阐明经济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已。

为了更加直观或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在此借用狐兔博弈为例。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角“不期而遇”了，为了生存这一最高目标——无疑是它们各自的最大利益所在，狐狸疯狂地追赶和兔子没命地逃窜，对两者而言，便均为最佳行为选择了。在此追捕与逃窜博弈过程中，兔子突然发现前方有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为了避免成为“守株待兔”者的盘中餐，兔子的最佳选择便是急转弯以期躲开大树，尽管一般而言跑直线对兔子来讲是“更”合理的策略。而作为追捕者的狐狸，由于可以提前及时修正其追捕路线，显然这亦是它的最优选择，便将会尽得抄近路之利，并最终取得这场博弈的胜利。

兔子最终被狐狸吃掉的结局，对某些局外人而言可能有点儿残酷。好在我们这个故事还有其另外一种可能的结局。在这场“追一逃”博弈中，兔子遇到的不是一棵“意外的”大树，而是一片它非常熟悉的沼泽地。兔子为了逃脱而急转弯了。此刻狐狸为了“抄近路”而调整追捕路线。毫无疑问，两者的行为都是最优的，但这次的结局却是兔子赢了：狐狸掉进了泥潭

中而丧命。

上述两幕狐兔之博弈，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两位主角的命运罢了。因此，为了方便起见，我在这里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第一幕上。从这一幕狐兔博弈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不少寓意深远的东西。在这场博弈中。兔子的行为及选择自始至终都应该说是理性的或是最大化的。换句话说，兔子始终是在扮演着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准确说是个“经济动物”）的角色。然而不幸的是，或多少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兔子的最终结局却是灾难性的。就狐狸的行为选择而言，亦始终是严格地遵循着经济学中的最大化原则的，但其结果却和兔子的截然相反。同是最优行为，但结局却大相径庭。这便是我从此故事中领悟到的第一点启示。

直观之，导致上述兔死狐口结局的直接原因，在于那棵“树”。恰恰是由于该树的存在，才铸成了兔子的最优行为导致了最糟结果这样一个结局。考察那棵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树”是什么，确切地说是为它在经济学中找到适当的位置，乃是笔者甚为关心的话题。对兔子来讲，此树是一个外在的客观事实；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存在是一个不利的约束条件。把兔子引向灾难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急转弯，只有相对于“树”的存在这一约束条件而言才能成立。这也就是说，兔子行为或进行的选择只能是也应该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或最佳选择。由此可以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经济人”或“经济动物”的最大化行为仅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结论可以也应该作为对经济人假定的一个重要补充或修正。通常所说的经济人必定是面对各种约束条件的。对这种不受限制的并总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的怀疑，也或多或少地基于这一点。美国

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针对理性经济人而指出了所谓寻求令人满意结果（注意，不是最优结果）的“决策人”。在定义这种人的时候，人们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用最尖的针缝补衣服显然是最佳选择；但在几百万根针当中，为了找到最尖的针必须对每根针加以比较才行，故过于麻烦。因此人们通常不去选择最尖的针而只选用一根可缝补衣服的针就行了，即令人满意的针。西蒙在此是对的。但如果要把“决策人”说成是非最大化的有着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就不能让人接受了。考虑到寻找最佳选择的代价——试几百万根针，选择令人满意的方案（即可用的针），无疑是“决策人”的“最佳选择”。回想一下我们故事中的兔子，它按理说是“可以”去设法获取有关“树”的信息的，但这样做的成本或风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极高的，或是条件不允许的。我在此所说的代价、成本或风险等，都是一回事，即约束条件。由此可以说，经济人假定是普遍成立的，但他（她）必须是处于特定约束条件之下的。这便是从狐兔博弈中引出的第三点启示。

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传统的经济人假定没有将经济人的行为和结果加以区分，而是把两者视为同一，即人的（或动物的）最优行为必将导致最佳结果。在此，狐兔博弈中所提示的东西就显得极有意义了：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当事者的最优行为或最佳选择和最理想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很可能是相互脱节或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各博弈的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只是导致最理想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便是笔者得到的第四点启示。在此，我是假定所有人或动物毫无例外地都是某种博弈的直接当事人或参加者。

我们已经了解到，虽然是最优行为，但是狐狸和兔子的最终命运却会由于特定的约束条件——回忆一下那棵“树”——

而迥然不同。在我们的故事中，狐狸无疑是特定约束条件的受益者，而兔子却是牺牲品，其损失为无穷大。一般而言，在面对各种特定的约束条件时，每一博弈参与者的损益状况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完全可能是零和的，即某些人的获益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受损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狐兔博弈便属于零和博弈一类。特定约束条件对各个博弈活动的参与者的命运施加着不同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说是我从狐兔博弈中感受到的第五个启示。

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上面几点启示统一称之为“狐兔原理”，当然，在此要做的首要之事是把动物——狐狸和兔子——还原为经济人，尽管在一般意义上其行为和人无异。我此时所谈的经济人，是指那些博弈的参加者，他（她）们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准确说是依据特定的规则进行博弈活动，并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那棵带着神秘面纱的“树”，在经济学中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它是人类行为的约束条件；它制约同时也刺激着人类去进行某种选择以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它同时亦是某些经济规则的集合。在了解了其基本特征后我们就不难发现，那棵“树”只能是经济制度的化身。在此，经济制度是由一系列经济规则以及对规则的解释（典型的例子就是意识形态）所构成。而经济规则的“硬核”——我在此借用一下拉卡斯的术语——当首推产权关系，准确地说私人产权的受限制程度：财产是否具有排他性或明确地被加以界定；财产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就排他性而言，它主要涉及到财产的使用权和收入（分配）权。

既然提到了产权，那么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它与人们熟知的所有权的关系。依照我的粗浅理解，所有权是指各种财产或资源最终归谁所有。一般来说，有了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便同时拥

有了其产权，即转让权、收入权和使用权。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英国土地的所有者是女王，但其产权却大都集中于私人手中，封建时期中国的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乃皇帝，正所谓“天下之土莫非王土”，但土地这一基本资源仍可能转让于私人之间，由此可以看出，对资源配置产生直接且重要影响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权关系。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的，但这无碍于住户对资源即居住空间的最有效的利用，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有着某种程度的产权：排他性和使用权。可见公共所有权和相当程度的私人产权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按照“狐兔原理”，我们很自然地会得出下面的结论：在特定的经济制度内，每一位博弈的参加者都是经济人，而且其行为或选择都是最合理的。当人们在使用财产或资源而其收入权受到限制时，比如说收入多寡同劳动或资源贡献无关时，偷懒便自然成为他（她）们的最佳选择了。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私人产权加以限制的结果之一，是在中国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是所谓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也正是在此制度下，普遍的、且越发不可收拾的寻租行为便显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恰是现行制度鼓励了或在刺激着少数人去凭借权力、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恰恰是由于财产权的排他性（即产权界定模糊）受到了损害，才引发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病症。后者又成为管理低效率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温床，成为导致企业和个人创新精神萎缩衰减的基本动因。可见，正是经济制度依靠其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在幕后操纵着民族国家之兴衰的命运。今天的中国，要革除的首先应当是那些陈规陋则，以便把绝大多数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纳入国家兴旺发达之轨道。

就每位经济人而言，尽管其行为在特定经济制度下是最优的，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行为的最结局（不仅仅可能于整个国家兴盛不利）还极可能是灾难性的。且不说那些贪赃枉法之辈的结局，工作偷懒本身这一“最优行为”带来的危害，其终极承受者，恐怕还是人们自己。在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无疑这种价格制度不合理）时农民弃农经工经商恐怕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了。可一旦出现天灾，首先面临饥荒之险的，恐怕也还是农民自己。“狐兔原理”所提示的最优行为与最佳结果相互的背离现象，被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事实所证实。就此看来，除了努力扬弃旧有经济制度外，让每位当事人理解其个人选择与其终极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或各种可能结局，同样显得十分必要。

由此推出的一个派生结论是：人在面对制度约束的同时，往往还受到信息量的制约。当然，从一般意义看，经济制度制约也恰恰是以各种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它的作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有所不同。实际上，人们对后者的态度或取舍，通常是决定于制度约束的，至少是受到制度约束的影响的。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制度对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决定性影响这一陈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制度是人自己构造的呀！为什么人们去构造并接受一个最终可能会于己不利、甚至有害的制度呢？坦率地讲，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好问题。莎士比亚曾借其笔下人物之口说，初生婴儿是在为由傻瓜们设计的舞台（即制度）而哭泣。莎翁的这一表述，至少显示了他的批判意识；而更为深层的暗示似乎还在于表述实质上是在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可能是那些所谓的“傻瓜”）要去设计某种表面上看是愚蠢的“舞台”？对此问题的解答应该说是已经蕴含于“狐兔原理”之中了，即某一种制度对不同的参与者